



搞懂經濟

Murray N. Rothbard／作者
吳莉瑋／譯者

搞懂經濟

Making Economic Sense

吳莉瑋 | Ravi L.W. Wu

This book is for sale at http://leanpub.com/Making_Economic_Sense_Chinese_Version

This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 2013-07-13



This is a [Leanpub](#) book. Leanpub empow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with the Lean Publishing process. [Lean Publishing](#) is the act of publishing an in-progress ebook using lightweight tools and many iterations to get reader feedback, pivot until you have the right book and build traction once you do.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ed License](#)

Contents

版權聲明	i
前言	ii
譯者序	iv
搞懂經濟第二版簡介	vii
 搞懂經濟	 1
1. 真的是「笨蛋，問題在經濟」嗎？	2
2. 十大經濟迷思	6
3. 討論「議題」	19
4. 創新經濟語義學	23
5. 混沌理論：由內擊破計量經濟學？	26
6. 統計：由內擊破？	29

CONTENTS

7. 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	32
8. 利率問題	35
9. 儲蓄過低？	39
10. 淺談供給面學派	42
11. 凱因斯主義者迷思	45
12. 凱因斯主義的終極版	48

版權聲明

原版版權：

© 1995-2006 由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於 mises.org 以
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發表

ISBN: 0-945466-46-3

中文版版權：

© 2013 由 LW Studio 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授權發表

LW Studio

Taipei, Taiwan

www.lwstudio.org

前言

Murray N. Rothbard (1926-1995) 除了多方面的學術貢獻外，還有著說服公衆的熱情。只有當普羅大眾知悉自由市場的重要與國家主義的嚴重後果時，自由社會才能持續。這是為什麼 Rothbard 希望說服大家自由經濟的美德。對 Rothbard 而言，教育公衆不僅是戰略需要，也是道德義務。它也有很多樂趣。

1982 年到 1995 年間，Rothbard 每個月都在《The Free Market》上解釋各種經濟活動。他以清晰明快的散文呈現理論與政策且從未犧牲學術嚴謹性。遵循 Mencken 的寫作規則，Rothbard 明確的寫作是他清晰思想的產物。即使當討論主題是利率或消費稅等痛苦又枯燥的經濟學科目時，Rothbard 也能寓教於樂。

《The Free Market》裡的文章是他留給我們的重要遺產之一。他串接兩黨在各政府部門與相關利益間的關連，讓我們看到遵循奧地利學派原則的經濟學家起的作用。

第二版增加了《貿易保護主義與繁榮破壞》、《回歸市場貨幣》及一篇於 1973 年公開，簡短但感人的 Mises 訃聞。《貿易保護主義與繁榮破壞》為 Mises 研究所在 1986 年出版的專著。《回歸市場貨幣》則是 1991 年發表的文章，提供激進的民粹主義貨幣改革方案。

不管經濟學界如何專業化與遠離現實，Rothbard 證明了真理始終能被廣泛溝通。在此與其他各種領域中，Rothbard

向我們展示了方法。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歐本／阿拉巴馬州（美國）

2006 年 1 月

譯者序

身為經濟學門外漢的我，因緣際會下連結到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的網站，透過網站上面豐富的開放式文獻庫，網站採用姓名標示的創用 CC 授權，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在書海中遊蕩，從此展開刺激的自學式二次價值觀改造，其後，我抱著對自由的熱情而設立了推廣奧地利學派觀點的 LW Studio 網站，為了推廣自己閱讀思考過後產生諸多共鳴的學派，開始在自己的網站中嘗試寫作，用自己的語言闡述消化過後的經濟學概念。

然而，著手寫作後才發現，要能清晰地思辨一個簡單的概念，沒有看起來那般容易，每個議題都環環相扣，而每篇文章也得重度引用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的資料，由於這些資源幾乎都是英文，直接引用到中文寫成的文章中並不恰當，加上諸多扎實又精闢的論述內容卻苦找不著中文資料可供博引，自然興起為自己的信仰盡一份微薄之力的想法。

這本書為我回報 Mises Institute 帶來之心靈滋養的一點微薄心意，利用業餘時間無償意譯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的《Making Economic Sense》（第二版），並同樣採用姓名標示的創用 CC 授權發行。

《Making Economic Sense》中文版的名稱訂為《搞懂經濟》，原書為 Murray N. Rothbard 發表在《The Free Market》月刊的文章選集，廣泛選錄 Rothbard 淺白又精闢的散文，內容涵蓋了經濟學理論介紹、美國與國際政治評論、經濟現象分析以及奧地利學派巨擘傳記等。

選擇《Making Economic Sense》進行翻譯的原因，除了切割成單篇獨立的散文便於逐篇翻譯追蹤進度外，也因為文章內容的廣度讓我在翻譯的過程中，能以不同於閱讀理論專著的心情，實際地透過 Rothbard 敏銳的觀察，重新以「奧地利學派」的角度解讀世界上曾經發生過，或者也正在發生的經濟與政治活動。

由於斷斷續續花了數個月的時間才完成原書一百多篇散文的意譯，並陸續將譯文發表於 LW Studio，許多翻譯上的不一致在此次集結成專書發表時才一併整理與校對，在 LW Studio 發表的每篇譯文，都會以前言的方式增敘自己對該文的理解與引言，但在此書則刪除這部分的敘述。

其中需要說明的是，許多原文中出現的法令、人名、地名或甚至是俚語，並沒有通用的中文翻譯，因此，嚴格來說本書為「意譯」，除了將較不熟悉的人名盡量直接援用原文外，許多法令、文件或書刊的部分也特別加上《》符號以及英文原文來避免混淆，而一般台灣民衆熟悉的羅斯福、凱因斯、甘迺迪等人名，則酌量視原文語氣使用其譯名，此外，本書中 Rothbard 所指稱的布希是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老布希）而非 George Walker Bush（小布希）。

最後，要對有緣的讀者說聲抱歉，自己的英文素養不夠好加上並非經濟學專業，導致許多原文中的閱讀趣味轉換成中文後好像沒有那麼有意思，也可能會有學術不嚴謹的翻譯缺失，雖然我已盡力做到貼合原意，但仍希望對奧地利經濟學派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撥冗看看原文，相信會有不同於我所獲得的體會。

吳莉瑋 Ravi L.W. Wu

台北／台灣

2013 年 3 月

搞懂經濟第二版簡介

Murray Newton Rothbard (1926-1995) 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選擇有點模糊的思想家術語，因為 Rothbard 的興趣如此不同而無法依傳統分類。是的，Rothbard 是個沿襲 Ludwig von Mises 與 Friedrich Hayek 「奧地利學派」傳統的經濟理論家。但 Rothbard 還寫了一部詳細的「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歷史、兩卷經濟思想史、幾篇方法論文章，以及難以置信地清晰的經濟學課本。隨著現代經濟學的專業化，這些單獨的壯舉相當不尋常：你可以從事經濟理論、經濟史或經濟思想史（如果你不在乎找工作的速度），或者，如果你是少數所著散文能讓學生與一般民衆理解的經濟學家，你可以去寫經濟學的入門課本。除了像 Paul Samuelson（跟 Murray Rothbard）的怪胎，你不會同時做所有的事情，就像外科醫生可以專研心臟或大腦，但不會是同時。

我們還沒說完。除了對經濟學各個領域所作出的貢獻，Rothbard 寫了四卷（具挑釁意味的）美國殖民時期歷史。他還著墨於哲學、政治學與法學理論，集大成於一本 357 頁的演繹論文，解釋正義與自由社會中的天性與法律原則內容。哦，是的，我差點忘了：Rothbard 透過不斷呼籲與兩本專著，幾乎以一己之力創造了現代自由運動，一是解釋所有政府干預的可怕後果，二是給出無政府社會的虛擬藍圖。

你或許會說：「他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傢伙，毫無疑問是個

天才。但他肯定是個沒有幽默感的機器人，不斷對他無法辨識出的平凡者噴出孤獨且苦澀的批評。」

現在談到 **Murray Rothbard** 真正令人驚訝的方面，他是個很有趣的傢伙，一個真正的人。讀了散文後你很快會發現這點，但我擔心這本書是你唯一看過的 **Rothbard** 作品，你或許會覺得他著作的趣味取決於主題的沉悶程度。但你期望什麼呢？這些文章最初發表於《**The Free Market**》，它致力於經濟與政治議題，因此其主題可能會有些枯燥（儘管具有巨大重要性）。如果這是你的反應，你得去看看《**The Irrepressible Rothbard**》，該書集結了 **Rothbard** 一些較平易近人的論文。你會在那本書中會看到同樣無懈可擊的邏輯、殘酷的誠實和美妙的機智，還有反戰的論戰、種族與性別衝突的政治不正確沉思、出乎意料的合理陰謀論、對他認同的人所作的人身攻擊（不可否認這很有趣）、對柯林頓的抨擊，以及比任何當地報紙都更有見地的電影評論。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本書許多文章最初刊登於 **Ludwig von Mises** 研究所發行的月刊《**The Free Market**》，**Ludwig von Mises** 研究所成立於 1982 年，目的是為了推動並促進 **Rothbard** 敬愛的導師所遺留下來的思想。**Ludwig von Mises**（1881-1973）一生中都無疑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倡導者。（「奧地利」一詞引用於該學派先創者的國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並沒有研究維也納的失業率。）他最大的理論成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期時成功地將貨幣價格與主觀主義與邊際框架相結合，而當時的其他經濟學家只以易貨經濟來解釋價格。**Mises** 接續其導師 **Eugen von Böhm-Bawerk** **Knut Wicksell** 的成果，發展出商業周期理論，將商業周期的主因歸咎於中央政府操作銀行體系而非資本主義。（**Friedrich Hayek** 接續發展 **Mises** 的商業周期理論並因

此獲頒 1974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Mises 的另一個主要貢獻在於研究方法，他主張經濟法則是「人類行為學」(有關人類行為的邏輯或科學)的子集，與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定律無法相比。在自然科學中，我們觀察到實際結果(例如砲彈的軌跡)，然後提出假說來解釋作用的因果力量。相反的，在社會科學(無論是犯罪學、社會學、心理學或經濟學)中，我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大概知道作用的動力：當一個人搶劫銀行時，我們不會研究他身體原子的物理力量，而是問「什麼驅使他作出這個絕望的行為？難道他沒有明辨是非的榜樣？」等。(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用物理學家或化學家的方法，只是那不能帶來更多解答。他們肯定不能幫助偵探追回贓物！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需要深入賊的腦袋。) Mises 看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分析(至少在二十世紀早期)，並以邏輯推演的方式將這些經濟活動總結於人類行為的事實；換句話說，Mises 認為所有經濟規律都隱含一個事實，即，人是理性的(雖然會犯錯誤)並透過選擇手段(嘗試)達到預期目的。我特別提出這點，因為許多人傾向於把所有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混為一談，認為 Milton Friedman 和 Ludwig von Mises (或 Murray Rothbard) 基本上在說同樣的事情。這個經濟學基礎的問題是這種粗心分類的錯誤之一：與 Mises 和 Rothbard 的觀點相反，Milton Friedman 著名的是他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的辯護，即，將物理科學的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

Mises (與 Rothbard) 和其他自由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倡導者間，包括 Milton Friedman、還有 Lawrence Kudlow 或 Alan Greenspan 等最近的美國政治「保守派」英雄，還有另一個差異。確實，這些經濟學家都同意削減

資本利得稅有益於美國經濟，或者將最低工資提高為每小時 10 美元會傷害內陸城市的少數民族。在這層意義上，他們都「反政府」。但 Mises（特別是 Rothbard）在個人自由與自由企業的推廣上更加一致，且譴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Friedman 可能會提倡「負所得稅」，即，只有分辨計算金額的方法新穎的福利計劃，而 Greenspan 和 Kudlow 在美聯儲相關的議題上倒不覺得「政府是問題」。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些言論不公平且在政治層面上顯得幼稚。確實，對 Mises（特別是 Rothbard）最大的抱怨是他們的固執，因為不切實際的原則而不願意支持某個走往正確方向之行動的「教條主義」理論家。雖然我不同意這種反對意見，但在這篇簡介並非回答的地方。簡要地提一下，另一種流行的反對意見，說 Rothbard 是出賣者，說他是共產黨人、民主黨、貿易保護主義共和黨的盟友，取決於不斷變化的政治風向。不管你現在如何看待他的戰略眼光與對他有利的激進「無政府資本主義」運動增長，但 Rothbard 不會同時是教條式純粹主義者與機會主義的出賣者！

我希望我能說出一些 Rothbard 的個人軼事，讓你感受 Rothbard 這個人，但不幸的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正如很多人回想 John F. Kennedy 一樣，我記得聽到訃告消息的當時。當時我在希爾斯代學院（Hillsdale College）主修經濟學，一位同學向我提到「一位偉大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過世。我感到胃正下沉，問道：「不是 Murray Rothbard 吧，是嗎？」我的朋友回答說：「是啊，那是他的名字。」我非常地失望，因為，Rothbard 的著作（包括經濟領域與政治哲學）在許多方面上都成為我判斷自我成果的標準。在許多我不同意的問題上，我想親耳聽到他對於我的評論的

回答，現在都成為不可能。（是的，我像許多美國本科生一樣自學。）而另一方面，Rothbard 將許多我所同意的觀點牢牢烙在我的腦中。

你會在這個選集中看到這點。除了正確性，Rothbard 的散文也精確且直接。（相反的，Hayek 的觀點雖然有效且精確，但可能用了七個子句和三個分號。）你也將感到 Rothbard 極端廣泛的知識廣度。套用 Mark Twain 的話：「我年齡越長，Murray Rothbard 就變得越聰明。」我在教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進階班時第一次意識到這點，課程的其中一篇導讀是 Rothbard 在 1956 年著名的文章《重建效用與福利經濟學》。當時我剛從排名相當高的數理經濟學博士課程中畢業，認為自己很了解像期望效用函數理論（von Neumann-Morgenstern utility）那類的抽象概念。我很驚訝地看到 Rothbard 完全善於與這些數學演示，並指出其隱藏的（錯誤）基本假設。當我再次閱讀此選集後，對於 Rothbard 評論混沌理論的論文感到驚訝。由於一個「自發秩序」（即，從簡單的微觀基礎出現有序的宏觀現象）的榮譽研討會，我曾閱讀整本混沌理論歷史與當前應用的書，因此，我知道 Rothbard 也明顯地做了相同的事，他的文章引用了人名並以在細微處提供深度閱讀的建議。特別諷刺的是《搞懂經濟》幾年前出版時我也讀過這篇文章，而當時我必定略過這些細微之處，因為那個時候我也不太知道 Rothbard 在說什麼。

另一個我能分享的軼事，發生在我和我的母親與她的朋友的公路旅行上。當時我帶著《搞懂經濟》（第一版）上路，儘管我從頭到尾徹底讀過。旅途過程中母親的朋友覺得無聊，問我是否可以借她閱讀。我猶豫地同意，雖然我知道 Rothbard 的偉大，但肯定「普通人」會覺得他無聊和／或

瘋狂！但是，她看了幾頁後開始笑，甚至開始與我的母親討論這本書。她特別喜歡 Rothbard 的觀察，新建房屋沒法蓋得像舊房屋一樣堅固，因為「哦，我們現在負擔不起這種品質」。簡言之，我不記得到底是什麼帶走我的不安全感，這讓我覺得自己像十幾歲的孩子，那種感覺完全沒有根據。

雖然我們這些年輕自由意志論者，因為 George W. Bush 領導的共和黨帶來前所未有的赤字與侵略傾向，而紛紛感到震驚與失望，選集中的一些文章告訴我們這不是新鮮事。關於 Ronald Reagan, Rothbard 寫道：

把「擺脫政府」口號和「不斷升級的大政府」現實成功結合起來的政府，同樣會以繁榮和自由企業之名，帶來失敗的國家凱因斯主義，這決不令人意外。

在之後的文章中，他繼續說：

從雷根政府開始，在「工資所得稅」的「削減」已經被增加的「社會保險」部分給抵消。但是，由於公眾一直認為，社會保險不是一種稅，因此，雷根－布希政府以對抗加稅傾向邪惡民主黨而成為減稅英雄的姿態卸任。

至於中東問題，Rothbard 的《為什麼干預阿拉伯？》在今日看來仍是具有說服力的閱讀。（類似的現象也出現於重新觀賞已故喜劇演員 Bill Hicks 的起身咆嘯時。即使他在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已去世，觀眾在聽他批評「布希」的戰爭

理由以及他妖魔化 Saddam 的偽善時，得花幾分鐘才會發現 Hicks 指的是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老布希）。)

我在這篇簡介的開頭封 Murray Rothbard 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透過 Mises 研究所的努力，他在這次選集中的著作將繼續傳播到更廣泛的讀者。雖然這種信心顯得太快，也許，未來的作家將視 Murray Rothbard 為二十一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Robert P. Murphy

希爾斯代學院

2005 年 12 月

搞懂經濟

1. 真的是「笨蛋，問題在經濟」嗎？

首次發表於 1995 年 2 月。

柯林頓在 1992 年的競選口號之一「笨蛋，問題在經濟」仍持續沿用，如果真的是「笨蛋，問題在經濟」，那麼為什麼美國民衆心中沒將光榮的經濟復甦歸功於柯林頓？為此，柯林頓的支持者把 1994 年 11 月民主黨的慘敗（民主黨在 1994 年的選舉中共和黨贏得了國會的控制權），歸咎於沒有清楚地讓美國民衆知道美國目前經濟正繁榮的這個好消息。

一些較明智的柯林頓支持者意識到，因為總統和他的手下不斷地在美國各地重複「笨蛋，問題在經濟」的這個訊息，所以他們反而栽在選民的頭腦被 Rush Limbaugh 和他的同事們以另一種解釋而暫時混淆。

那麼，這個流行的推理什麼出了毛病？一如往常，這個政治分析中有很多層面的謬論。首先，是原油經濟決定論，通常被稱為「粗劣的馬克思主義（vulgar Marxism）」。雖然經濟狀態可能塑造公衆的政治態度，但仍有許多非經濟原因會造成公衆輿論。

公衆輿論會特別出現在犯罪議題、槍支管制、移民問題，持續地攻擊政府、主流自由主義文化、資產階級及傳統的道德原則等處。

其他非經濟原因：由寶貴經驗得來而非受犬儒主義感染的懷疑論者逐漸增加，他們對於政客兌現競選承諾抱持懷疑。更何況撇開經濟問題，選民因本能反應，而對總統、他的妻子及他們的個人特質（下稱性格問題）所產生的強烈反感，也對選舉造成強力衝擊。

但即使不論究衆多公衆政治態度與行為的非經濟動機，「經濟問題」的一般性說法甚至偏離了一些以經濟為基礎的重要政治考量。著名的柯林頓口號甚至沒有把重點放在經濟的相關面向上。

相反地，若要捕捉柯林頓支持者的意思，口號應該改寫為「笨蛋，問題是商業週期」。柯林頓之持者與媒體真正提倡的是「粗劣的商業週期的決定論」：如果經濟的蓬勃發展，執政黨會連任；如果經濟衰退，選民會推翻執政黨。

「商業週期」看起來好像等於「經濟」，但其實它不是。選民所感受到的經濟面向，並不是所謂的周期，或是繁榮與蕭條之間的變換過程，而是一些「現世」（長期）的趨勢反映。選民在意的是用一些無形又不可測量的「生活品質」概念來衡量的稅率與生活水平變化，更甚於我們理論上是在經濟週期上的膨脹或收縮階段。

的確，經濟困境影響公衆的主要不是繁榮與衰退的周期變化，而是那些現世且似乎是永久性的生活水平下降，這些過程特別緩慢且看起來難以避免的生活水平下降，不僅磨耗人們的精神，還有他們的荷包。各級政府持續調漲那些侵蝕收入的稅。雖然以各種「規費（fees）」、「貢獻（contributions）」或「保險（insurance premiums）」的名目偽裝，它們終究是不斷榨乾人民的稅。

而那些政府編制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和金融專家，不斷

宣稱「通貨膨脹已被克服」、「經濟結構避免回到通貨膨脹」和其他的廢話。所有的消費者的心裡和荷包都清楚，他們花在超市、商店、學費、保險，跟訂閱雜誌的費用持續上漲，而美元的價值則不斷下跌。

經濟「科學家」輕蔑的指控消費者經驗只是「傳聞」，他們鐵錚錚的數據和處理過的統計表示，經濟正在活力增長、經濟表現出色、通貨膨脹已經結束，和其他於事無補的發言。最終，這些「科學」只有成功地說服公眾，把那些經濟、統計專家和一堆律師、政客一起排名在「假情報專家」的行列裡。

如果一切都這麼好，公眾越來越希望知道，為什麼今日的年輕夫婦再也負擔不起他們父母親新婚時的同樣生活水平？為什麼他們買不起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美國的輝煌經驗讓每一代人都期望孩子過得自己好。這種期望從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源於每個上一代確實比他們的父母過得更好的經驗。

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完全相反。人們知道自己過得比他們的父母更糟，因此，他們理性地預期自己的孩子也會過得更糟。無論你到哪裡都會得到類似的答案：「為什麼你不用五十年前蓋堅固房子的相同品質來蓋這間新房子？」「哦，我們負擔不起」。

即使是官方統計數據也證實了這點，如果你知道去哪裡找數據的話。例如，美國家庭的實際收入中位數（即剔除通貨膨脹）低於 1973 年。接著，如果我們把家庭結構拆解來看會更悲觀，家庭收入不僅減少，還因為在過去二十年中已婚婦女在勞動力比例顯著增長而面臨崩潰。

這種由家庭進入辦公室的大規模轉變，被詮釋為自由主義

文化下女權主義的光榮勝利，把女性由家庭主婦的苦差事解放，讓女性在職業生涯中發展自己的個性。雖然對某些職業來說可能真的是如此，但我們還是常常聽到「我去工作是因為我們再也不能靠一份薪水過生活」。

因為沒有辦法量化主觀動機，我們無法衡量這一因素，但我懷疑，大批從事一般勞動的職業婦女，工作只是為了避免家庭收入急劇下降。若是讓她們的夢想變成現實的話，我懷疑她們會愉快地回到備受指責的尼安德特人時代下的「奧茲和哈里特」家庭。

當然，也有一些經濟領域的確發展迅速，價格不升反降，特別是電腦產業和被大肆宣傳的「信息高速公路」。在不遠的未來，美國人可以把自己的苦難沉浸在 500 個各種提供垃圾訊息（mindless pap）的互動式數位化頻道裡。

這種未來或許可以滿足 Alvin Toffler 和 Newt Gingrich 等大師級未來學家，但我敢打賭，我們其餘的人會越來越不開心，並準備抨擊通過大量稅收、廉價資金與信貸、社會保險計劃、命令，及政府監管，帶給我們如此惡化之現世和荒涼美國夢的政治制度。

2. 十大經濟迷思

首次發表於 1984 年 4 月。

我們的國家透過大量的經濟迷思來扭曲公眾對於重要議題的思路，導引我們接受不健全又危險的政府政策。以下介紹這些經濟迷思中最危險的十個並分析這些經濟迷思錯在哪裡。

迷思 1：政府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政府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

最近幾十年聯邦政府總是赤字。反對黨對此的一致回應，是譴責那些財政赤字是造成永久通貨膨脹的原因。而執政黨對此的一致回應，則是宣稱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敵對雙方的主張都是迷思。

赤字是指聯邦政府的支出超過它所收取的稅。解決這些赤字的資金來源有兩種方式。如果資金來自政府向公眾銷售的國債，那麼赤字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在這種方式下，沒有「新錢」產生，個人或者是公司行號純粹是用自己的銀行存款支付政府債券，然後讓國庫把這些錢花掉。這些錢只是由購買債卷的公眾手中轉移到國庫，然後再由國庫把這些錢花在其他人民身上。

另一方面，解決赤字的資金也可以透過向銀行體系出售債券取得。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會透過增加銀行存款的數字來創造「新錢」，再用這些「新錢」來購買政府債券。這些以銀行存款形式被創造出來的「新錢」被政府花掉後，就會永久地進入經濟體系的消費流中，提高物價並導致通貨膨脹。透過複雜的過程，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允許商業銀行以十分之一的準備金來創造「新錢」。因此，如果 A 銀行要購買 100 億美元的新債券來資助赤字，美聯儲會先從 A 銀行手中購買約 10 億美元的舊國債，而美聯儲所購買的 10 億美元舊國債，可以增加 A 銀行 10 億美元的銀行準備金，換句話說，A 銀行可以因為這新增加的 10 億美元銀行準備金，創造 10 倍的新銀行存款（也就是可以拿來購買資助赤字的 100 億美元債券）。簡言之，政府和政府控制的銀行系統實質上「印」了新錢來支付聯邦赤字。

因此，如果赤字的資金來源是銀行體系，那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如果赤字的資金源自公眾，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一些政策制定者指出，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政府赤字加速的同時通貨膨脹速度趨緩，並拿來當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的「統計證據」。但這並不是證據。一般物價的變化受兩個因素影響：錢的供應量與錢的需求量。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美聯儲以每年約 15% 左右的高速創造新錢，大部分的「新錢」都拿去資助不斷擴大的赤字。但另一方面，這兩年對於經濟蕭條下嚴重商業損失的反應，增加了對貨幣的需求（即降低在商品上花錢的慾望）。這種貨幣需求增加的暫時補償效應並沒有讓赤字比較不通膨。事實上，在景氣復甦過程中，消費的增加使得貨幣需求量下降，而花費這些新錢則加速通貨膨脹。

迷思 2：赤字對私人投資沒有擠出效應。

近年來對於美國偏低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有一些合理的憂慮，其中之一，是巨大的聯邦赤字會把儲蓄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政府開支，從而排擠具生產性的投資項目，可能會造成公眾生活水平的降低等長遠問題。

一些政策制定者再次試圖以統計數據反駁，宣稱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赤字增加但是利率下降，並表示財政赤字沒有擠出效應。

這種主張再次顯示試圖以統計反駁邏輯的謬誤。利率的下降是因為經濟衰退下商業貸款的需求下降，但「真實利率」（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則保持前所未有的高，部分原因是因為公眾預期下一波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擠出效應。在任何情況下，統計數據不能反駁的邏輯，邏輯告訴我們，如果部分儲蓄被轉移到政府債券上，生產性投資可用的儲蓄就會減少，而利率則會比沒有赤字之前還高。如果由赤字資金來源由公眾提供，儲蓄轉移到政府項目是直接且明顯的。如果赤字資金來源為銀行信用擴張，轉移是間接的，擠出效應會發生在政府用「新錢」和民間儲蓄之「舊錢」爭奪有限資源時。

Milton Friedman 試圖反駁政府赤字的擠出效應，聲稱所有的政府支出，不僅是赤字，都會排擠私人儲蓄和投資。的確，被稅收所抽調的資金本來也可以進入私人儲蓄和投資。但赤字相對於整體政府支出而言有更大擠出效應，因為直接由公眾資助的赤字明顯地減少儲蓄，而稅收則會同時減少公眾的消費與儲蓄。

因此，無論從哪種角度看，赤字都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

如果赤字由銀行體系資助，會造成通貨膨脹。即使赤字直接由公眾資助，也會導致嚴重的擠出效應，把儲蓄從更迫切的私人投資項目中轉移到浪費的政府項目上。此外，越多的赤字就必須支付越多的固定利息，造成永久的稅務負擔，通膨赤字帶來的高利率更加劇了這個問題。

迷思 3：增稅是治愈赤字的藥方。

不幸的是，這些擔心赤字的人提供了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解決辦法：增加稅收。通過提高稅收來解除赤字相當於為了醫治支氣管炎而開槍射殺病人。「藥方」遠比疾病更糟糕。

原因之一如同許多批評者所指出的，加稅只會給政府更多的錢，讓政客和官僚進一步提高支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指出：支出隨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政府願意保持 20% 的赤字，當政府有更高收入時，它會提高消費支出來保持相同比例的赤字。

即使撇開這個精明的政治心理學判斷，為什麼仍有人認為稅收比通貨膨脹好？的確，通貨膨脹是另一種形式的稅收，政府或是較早收到這些「新錢」的成員可以剝奪那些在通貨膨脹晚期才提高收入的其他公眾的財富。不過，至少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人們仍然可以從自願交換的過程獲得一些好處。如果一條麵包上升到 10 美元，這是不幸的，但至少你還是可以吃到麵包。但是，如果稅率上升，你的錢就直接被政客和官僚的利益給徵用，你得不到任何服務或福利。唯一的結果，就是從事生產的大眾所掙來的財富被官僚機構沒收，然後這些官僚機構再用部分沒收來的錢來欺壓、羞辱並傷害公眾。

唯一可以治愈赤字的藥方很簡單卻幾乎沒被提到，那就是削減聯邦預算。怎麼削減？要削減哪裡？任何地方。

迷思 4：每次美聯儲收緊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每次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

財經媒體在知道一些經濟學原則後，開始像老鷹一樣盯著每週的貨幣供應數字看，但他們不可避免地以混亂的方式詮釋這些數字。如果貨幣供應量上升，會被解釋成利率降低和通貨膨脹，經常在同一篇文章中，貨幣供應量上升也被解釋為加息。反之亦然。如果美聯儲收緊貨幣增長率，既會被解釋為提高利率，也會被解釋為降息。有時看來，美聯儲的行動不管多麼矛盾，必然導致加息。顯然，這是非常錯誤的。

物價水平的問題在於，有許多偶然因素分別在不同面向上影響利率。如果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它會產生更多的銀行準備金，從而擴大了銀行信貸及銀行存款的供應量。信貸擴張必然意味著信貸市場的供應量增加，從而降低信貸的價格或是利率。另一方面，如果美聯儲限制信用擴張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造成信貸市場的供應減少，導致利率上升。

這種現象會發生在長期性通貨膨脹的前十年到前二十年間。美聯儲擴張信用將降低利率，而限制信用擴張則會加息。但過了這個階段後，公眾和市場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象進行調整。他們開始認識到，貨幣供應量的計畫性擴張將

導致長期的通貨膨脹。當他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他們也同時認識到通貨膨脹抹去債權人的利益而對債務人有利。因此，如果有人提供一筆年息 5% 的貸款，而當年通貨膨脹率為 7% 時，債權人將面臨損失而不是獲益。債權人損失 2% 因為他一年後得到的本金加利息已經減少了 7% 的購買力。與此同時，債務人則因通貨膨脹獲利。當債權人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實時，他們會把通貨膨脹估算在利率中，而債務人也將願意支付。因此，從長遠來看，任何提高通膨預期的訊息將會提高（調整後的）利率，而任何減少通膨預期的訊息則會降低（調整後的）利率。在這種情況下，當美聯儲限制擴張時就會傾向於抑制通膨預期並降低利率，而美聯儲擴張信用時將會掀起通膨預期並提高利率。由於有兩個相反的因果關係鏈在作用，因此，美聯儲的信用擴張或緊縮與利率波動的關係，取決於哪一個因果關係鏈的強度較高。

到底會是哪一個因果關係鏈較強？沒有辦法知道肯定答案。在通貨膨脹的前幾十年，不會有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但是在通貨膨脹的後幾十年裡，也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會開始出現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而這種因應通膨調整的溢價強度和反應時間，則取決於公眾的主觀預期，無法被確切預測。這也是經濟預測永遠不確定的原因之一。

迷思 5：使用圖表或超級電腦計算模型的經濟學家可以準確地預測未來。

預測利率的問題說明了預測行為的普遍陷阱。相反地，人們的行為並不能被事先準確預測。他們的價值觀、想法、期

望和知識總是不斷地以不可預知的方式在改變。有哪個經濟學家可以預測（或預測過）1983 年聖誕節的椰菜兒童熱潮？每一種經濟量、每一個價格、每次採購或是收入數字，都是上千上百萬個不可預知的個人選擇集結後的綜合表現。

許多由經濟學家所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研究，都顯示經濟學家一貫糟糕的預測記錄。氣象預報員經常抱怨說，只要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他們可以做得更好，但在掌握趨勢變化上卻有困難。延續目前的趨勢並外推到不久的將來並沒有竅門，你不需要複雜的超級電腦計算模型，只要用一把尺就可以做的更好更便宜。真正的關鍵是準確預測趨勢的改變和問題預警。沒有一個經濟學家預測出 1981 到 1982 年經濟大蕭條，也沒有人預測到 1983 年的強力復甦。

下次當你在經濟術語或貌似專業的經濟預測上搖擺不定的時候，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他真能預測未來，為什麼要浪費他的時間在推出電子報或當顧問，而不是在股市或商品市場中成為萬億富翁？

迷思 6：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間存在權衡。

每當有人呼籲政府放棄通貨膨脹政策時，經濟學家和政客們都警告其結果是嚴重的失業問題。我們因此落入以通貨膨脹來對抗高失業率的陷阱，並被說服必須接受兩者中的部分結果。

這一學說是凱因斯主義者的退路。剛開始，凱因斯主義者向我們承諾，通過操縱、微調赤字和政府支出，他們可以在沒有通貨膨脹下帶給我們永久的繁榮和充分就業。接著，當通貨膨脹轉為長期且越發嚴重時，他們轉向警告失業率

和通貨膨脹間的權衡，以削弱任何可能施予政府停止通膨政策、創造新錢的壓力。

權衡理論是基於多年前由英國經濟學家 A.W. Phillips 所發明的菲利普斯曲線 (Phillips curve)。菲利普斯把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擺在一起，並聲稱這兩個變量成反比：工資率上升得越高失業率越低。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奇特的學說，因為它挑戰了邏輯上的常識性理論。理論告訴我們，更高的工資率會造成更大的失業率，反之亦然。如果每個人都去雇主面前堅持要兩倍或三倍的工資，我們馬上會失去工作。然而，這種奇怪的發現卻被凱因斯主義的經濟學接納為福音。

至此，這個統計發現很明顯地違反事實與邏輯理論。1950 年代的通膨率每年約 1%~2%，失業率則徘徊在 3%~4%，而後失業率介於 8%~11%，而通膨率在 5%~13%，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通膨率和失業率都急劇增加。如果要總結，我們可以歸納出反向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除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之外的任何解釋。

儘管理論家不斷宣稱他們以事實測試自己的理論，但他們很少對事實讓步。為了要保存「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的概念，他們的結論是菲利普斯曲線仍然顯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但是這個曲線莫名其妙地「轉移」到另一組新的權衡。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然，沒有人能反駁任何理論。

事實上，目前的通貨膨脹，即使能利用高漲的物價來降低實質工資而在短期內降低失業率，通貨膨脹的長期結果只會造成更高的失業率。當工資率最終趕上通貨膨脹時，通貨膨脹帶來的經濟衰退和失業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超過二十年的通貨膨脹後，我們現在正處於所謂的「長期階段」。

迷思 7：通貨緊縮與價格下跌不可想像，並將導致災難性的蕭條。

公眾的記憶是短暫的。我們忘記從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物價年復一年地普遍下降。這是因為，在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斷增加的產能與和產量使得物價下跌。這並不是蕭條，而是售價隨著成本下修。通常情況下，工資率保持不變但是生活成本下跌，使得「實際工資率」，或者說每個人的生活水平呈現穩定上升。

事實上，在這兩世紀間只有在戰爭時期才發生物價上漲（1812 年的戰爭、南北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因為交戰各國的政府為了支付戰爭的龐大支出，以超出產能增長率的增長速度急速膨脹貨幣供應量。

我們可以從觀察過去幾年的電腦價格，看到沒有政府或央銀通膨負擔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如何運作得宜。過去，即使是簡單又龐大的電腦也需耗資數百萬美元。現在，因為半導體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激增，電腦價格不斷下降。儘管電腦的價格下降，因為成本下降、產能提升，電腦公司仍是成功的。事實上，成本和價格的下降使電腦公司能夠深入大眾市場，進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的蓬勃發展。通貨緊縮並沒有為這個行業帶來災害。

對於其他高增長行業也同樣如此，例如電子計算器、塑料、電視機和錄影機等。通貨緊縮並非帶來災難，而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標誌。

迷思 8：最好的稅是單一稅，針對收入採恆定比例，沒有豁免或免稅額。

單一稅的支持者通常認為消除稅務豁免或免稅額將使聯邦政府大幅削減現行稅率。

但這種觀點假設，目前的所得稅豁免或免稅額是不道德的補貼或漏洞，應該為了公眾利益而取消。稅務豁免或免稅額是「漏洞」的這種說法，僅在您認為政府擁有每個人 100% 的收入下才成立，在這前提下，允許一些收入保持免稅才會構成「漏洞」。允許一些人保有自己的收入既不是漏洞也不是補貼。透過取消醫療保健、利息支付，或為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應稅扣除額來降低整體稅率，事實上只是降低一部分人的稅（那些不用支付太多利息、醫療費用或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人），同時提高另一部分需要支付這些費用的人的稅務負擔。

此外，沒有任何安全的保證，一旦取消了豁免和免稅額，政府還會將稅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看看政府過去和現在的記錄，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政府不斷擴大的官僚體制，會再把稅率至少提高到舊水平以課取更多的稅收總額。

（此段有酌增個人之理解說明內容）單一稅制假設推測稅收大致要與市場價格或所得收入類似。但是，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並不成正比（日所得 100 元的人與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買一條相同的麵包都是一樣價錢）。如果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成正比，那將是一個奇特的世界，例如日所得 100 元的人以 1% 的價錢購買一條 1 元的麵包，但是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被迫以同樣 1% 的價錢購買一條麵包——也就是 1,000 元。在這樣的世界裡，收支平等將以一個奇怪且低

效的方式執行。如果稅收要類似於市場價格，那應該是每個消費者都相同，而不是與消費者的所得收入成比例。

迷思 9：減低所得稅率可以幫助所有人，不僅是納稅人，政府也將從中受益，因為稅收總收入將因稅率減少而上升。

這是由加州經濟學家 Arthur Laffer 所提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它是政客用來化圓為方的一種先進手段，能夠減稅、維持政府支出，並同時平衡預算。這樣一來，公眾可以享受減稅、因預算平衡感到滿意，並同時收到政府相同水平的補貼。

如果稅率由 99% 減到 95% 稅收的確會提高。但是沒有理由去假設這種簡單連接在其他任何狀態下也會出現。事實上，這種關係在地方消費稅上的效果比在全國所得稅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幾年前，哥倫比亞特區政府決定大幅提高了該區的汽油稅來增加稅收。但是，駕駛人可以輕易地把車開過邊界去維吉尼亞州或馬里蘭州以較便宜的價格加油。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汽油稅總稅收最後減少，而懊惱又困惑的官員最後不得不取消汽油稅。

但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在所得稅上。人們不會因為小幅加稅或者是小幅減稅而停止工作或離開國家。

拉弗曲線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拉弗曲線效益要開始運作所需的時間從沒有被明確定義。更重要的是，拉弗假設我們大家都希望可以把政府稅收提到最高。「如果」我們真的處於拉弗曲線的上半部，那麼我們應該都希望把稅率重新

設定在“最佳”的點。但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應該希望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把稅收推進到最大，簡言之，就是私人產品可運用的資源份額被政府活動抽走。我想我們更感興趣的應該是減少政府的稅收，把稅率調整至遠低於任何拉弗最佳點的位置。

迷思 10：從其他低勞動成本國家的大量進口會導致美國人失業。

這一主張的諸多問題之一，在於它忽視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的工資高而國外的工資低呢？它從一開始就將工資差異當成既定事實，而沒有細究工資差異的成因與意義。基本上，美國的工資高是因為勞動生產率高，而勞動生產率高是因為工人有大量技術先進的資本設備幫助生產。在國外很多國家的工資率較低，是因為資本設備和技術相較原始，沒有資本的幫助，這些地區工人的工作效率遠低於美國。每個國家的工資水平都取決於該國的勞動生產率。因此，美國的高工資並不是對繁榮的威脅，而是繁榮的結果。

但是，為什麼有一些美國產業長期且不斷地大聲抱怨低工資率國家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每個國家的工資率都在產業、職業與地區間相互關聯。所有的工人都互相競爭，如果在 A 產業的工資遠低於其他產業，那麼，工人與那些剛開始進入職場的新鮮人就會選擇離開或拒絕進入 A 產業，並轉移到其他工資率較高的公司或產業。

抱怨工資率高的那些產業，其工資率之所以高，是因為這

些產業與在美國的其他產業出價競爭勞動力的結果。如果美國的鋼鐵或紡織產業發現自己難以與國外同行的競爭，並不是因為外國公司支付的工資低，而是因為其他在美國的許多行業，把美國的工資率抬高到鋼鐵和紡織產業付不起的水平。事實是，鋼鐵、紡織和其他類似的公司，相較於美國其他產業的公司，以低效率的方法使用勞動力。關稅或進口配額得以讓這些效率低下的企業或產業保持運作，進而傷害了其他不在這些產業裡的人。他們傷害了美國所有的消費者，保持了高價格、低品質與低競爭，並扭曲了生產進程。關稅或進口配額的做法，相當於為了保持國際運輸服務的人為高價，而強迫關閉一條鐵路或者是一間航空公司。

關稅和進口配額同樣也會傷害到其他試著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的美國產業。從長遠來看，關稅和配額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由政府賦予的壟斷特權，即使是受到保護和補貼的企業也不會成功。正如我們所看的鐵路公司和航空公司的例子，那些無論是透過關稅或者是法規而享受政府壟斷的產業，最終都效率低落且無論如何都賠錢，這些產業只會要求越來越多的政府救助、永久的擴大特權，以求獲得自由競爭下的庇護。

3. 討論「議題」

首次發表於 1992 年 2 月。

根據不同人的個性，總統選舉年期間可能會低潮抑鬱或覺得是樂事。選舉期間令人困惑的面向之一，是可敬的媒體將重新定義我們的語言。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個半世紀前寫下「控制語言的人執掌權力」，而媒體則顯示出他們已經學會這點。例如，媒體在選舉期間總是假定哪些才是「議題」。如果候選人 X 發現它的對手 Y 有貪污嫌疑，媒體就會急於驚呼：「這是不相關的，你為什麼不談論真正的議題？」

在布希和杜卡基斯的競選期間，媒體把「經濟」渲染為唯一值得討論的議題，其他的都是分心的煙幕。有人會認為，這樣的重點將會取悅所有經濟學家，但如果你這樣想，你就不算是編制媒體的語義專家。所謂「經濟議題」，只能以某種預定的狹義方式進行討論，任何其他嘗試都會被粗暴地判定出局。

媒體關注的焦點相當合理地落在「經濟衰退」，但是，只在某些被允許的狹義層面上。由於經濟衰退，失業率飆升（缺乏就業機會）、保障性住房減少（無家可歸者），及增加的醫療成本使得可負擔的醫療服務減少，除了這些特殊的焦點外，財政赤字已飆升至一年四千億美元。

簡言之，就業機會、醫療照護、住房和其他物質的缺乏，不管是明示或暗示，都伴隨的聯邦政府必須大幅度擴支，來

完成提供這些服務或者是看到這些服務被提供的「責任」。任何站起來說「聯邦政府沒有責任提供這些服務」的人，當然，會被警惕的媒體指控是在迴避而不是討論「議題」。

在媒體術語裡，「討論」議題指的是接受媒體的前提定義，並在這些前提下進行技術性的討價還價。例如，如果你說「國民健康保險等於是醫療服務公費化」，你會被指控「使用恐慌性字眼而不是討論議題」。任何認為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是重要問題的人，很快地就被撇到一邊。

但是，討論到聯邦政府數千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呢？啊，包治百病當然要大幅增加稅收。任何提出減稅並呼籲排斥加稅的主張都只是神話。雖然一般公眾可能仍對減稅的主張感到讚賞，他們通常被學者和媒體精英重度填塞完全相反的訊息：建議加稅是「面對議題」，是勇敢、負責任的等等等。

窄軌的討論也替華盛頓的政策書呆子帶來優勢，一些「立場應該中立」的「專家」準備好要丟出針對加稅政策或其它類似政策的所謂定量分析。因此，產生了這個未意識到的景象：候選人 A 建議加稅；對手 B 指控 A 的建議將耗費中產階級納稅人 X 億美元；A 指責 B「說謊」，因為 B 提出了與 A 不同的加稅建議，但有同樣的後果。

最惱人的是媒體對於他們的指控所做的「修正」：在紙上或網站上聲名「事實上」B 的加稅將花費納稅人 Y 億美元。媒體「修正」最令人討厭的，因為每個人知道，每個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都會對己方計畫做最好的估算，而把對方計畫做最壞的估算，但媒體卻把自己的偏見偽裝成客觀的真理和專業知識。

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人知道這些計劃的真正花費。這些

被視為福音真理並當作「事實」的數字，都依賴於各種荒謬的假設。例如，他們都假設不同經濟變量間的定量關係，會持續過去幾年間的表現趨勢，然而，這些經濟變量卻是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發生變化。

不然，為什麼沒有電腦經濟學家和政策書呆子有預測出目前的經濟衰退？沒有一個預測得出此次衰退的長度和深度？正因為這次經濟衰退，就像所有的經濟衰退一樣獨一無二，如果不是一些數字的突然變化，就不會出現經濟衰退，我們仍然可以享受一個看似平靜的繁榮。正如前德國銀行家 Kurt Richebächer 在《貨幣和信貸市場通訊》(Currency and Credit Markets) 中指出，現代的經濟學家不再像在 1920、30 年代時思考，他們只是輸入過時的數據，然後疑惑著為什麼預測趨勢的結果為繁榮。

下面是永遠上不了媒體「議題排行榜」的建議：是的，赤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擺脫赤字的方法絕對不會是在經濟衰退期間加稅，而是削減政府支出。相較於傳統的媒體學，加稅除了以技巧性的計算方式呈現外，並不等於削減支出。增加稅賦或政府支出，危險地加劇了不事生產的公共部門對於日益貧困的生產性私營部門的寄生負擔，而減少稅賦或政府支出，卻能減輕生產性私營部門的枷鎖。

長遠來看，正如我們所目睹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寄生於私營生產部門的公共部門，在寄生的過程中不僅破壞、損害了私營生產部門，甚至也損害到公共部門自己。但諷刺的是，那些關注環境狀態、地球永續的左派自由主義者，卻採取一種短視的角度看待經濟：只有眼前的問題才算數，儲蓄者，投資者和企業家，誰在乎？

要削減哪部分的政府預算？最簡單的方法是最好的：只要

通過一項覆蓋所有現存法律的新法，限制所有聯邦政府機構不准花超過「某一年」的支出，這個「某一年」越早越好，不如就定在 1979 年如何？那年聯邦政府共支出 5,040 億美元。只要立法限制任何機構的支出都不能超過 1979 年的支出數字，那些 1979 年以前不存在的機關，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當然也可以生存—零預算。

當然，這個建議對於那些編制下的政策書呆子而言，過於簡單，也過於激進。根據定義，它也不會出現在官方專欄的「討論議題」裡。

4. 創新經濟語義學

首次發表於 1984 年 9 月。

聯邦政府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們，除了近年來在「創新經濟語義學」取得很大的進步之外，其他什麼都沒作好。首先，他們重新定義了看似簡單的「預算削減」。在過去，「預算削減」是指明年的預算比今年的少。在這種老式定義上，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任職總統的頭兩年，雖然幅度不大，但在實質上將當年預算削減至低於前年。現在的「預算削減」並不是真的削減，政府當年度支出實質上還多於上年度的支出。

「削減」被微妙地重新定義成其他東西的減少。到底是什麼東西似乎無關緊要，只要輿論焦點由實際美元花費移走就好。有時候「削減」是指「增長率減少」，有時是指「實際支出減少」，有時是說國民生產總值（GNP）的百分比，還有一些時候只是指實際支出少於預期支出。

這一系列「削減」的結果，使得政府支出已經在各個層面上大幅提高。結果就是，「預算削減」的創新語義早已超出美國《憲法》的範圍。

創新語義的另一個例子是 1981 到 1982 年的「減稅」，可怕的減稅被 1982 年底的急遽加稅抵銷，1983 年、1984 年以及將來的每一年都如此。同樣地，在舊時代，削減所得稅的意思是指薪水被少拿走一些。雖然 1981 到 1982 年的稅率變化對於某些人而言的確「少被收稅」，但對一般人而言，減稅

的效果被持續上升的社會保險費以及通貨膨脹下推進稅級的效果給抵銷。由於政府長期性地擴張貨幣供應量，造成通貨膨脹，最後使得每個人的名目所得收入也被提高（即使物價上漲早已抵銷所得收入上漲幅度），因此，一般民衆被迫進入更高的納稅級距。結果就是，即使官方稅率保持不變，一般人卻因收入提高而必須支付更高的稅率。

備受讚譽也備受譴責的「減稅」，若以老式的語義而言，事實上沒有減稅，而是大幅增稅。由於這種可疑「未減稅」，美國民衆得承受好幾年的「抵銷支付」，但不幸的，最終結果是「增稅」。

當然，政府的經濟學家們一直在為「增稅」上糖衣。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這些變化是「增稅」。他們沒有「增稅」，他們是「增加總稅收」和「填補漏洞」。Ludwig von Mises 為「漏洞」下了最好的註解：「漏洞」的概念意味著，政府理所當然地擁有所有你賺的錢，所以，政府有必要糾正它沒有課徵到的收入。

儘管從 1984 年來政府總是承諾平衡預算，但我們發現這幾年來的「預算削減」、「減稅」和「增加總稅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資赤字。再次，創新語義學使用歷史悠久的方法前來救援－重新定義「赤字」。凱因斯主義把「赤字」重新定義成「充分就業預算」，也就是說，如果減去必要的開支以實現充分就業，就沒有赤字，甚至可能會結餘。雖然這種戲法對 200 億美元的赤字有效，但想填滿 2,000 億美元的赤字還有段差距。不過，政府的經濟學家正在努力。

他們也把「赤字」重新定義成「債務實質增長」，換句話說，政府可以用通貨膨脹來抵銷「赤字」。在這種定義下，政府造成的通貨膨脹幅度越大，就好像能沖銷越多的赤字。在

相同的語義魔法下，1923 年德國的通膨災難性失控的辯護者聲稱，當時並沒有通貨膨脹，因為德國的價格以黃金計價的話實際上是下降！同樣地，他們聲稱，德國馬克的實質供應下降，因此德國真正的問題是不是印太多錢，而是印太少了。

沒有人會接受這種在詭辯下赤字就會消失的想法。但卻有一些觀點認為增稅來替赤字付「頭期款」是可接受的。同樣地，在舊時代，「頭期款」指的是還清部分債務。華盛頓那些充滿創意的經濟學家們，把「頭期款」這個術語重新定義成「減少隔年債務總數字的增加」，這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5. 混沌理論：由內擊破計量經濟學？

首次發表於 1988 年 3 月。

混沌理論是最近數學、物理學和相關科學的熱門新理論，儘管它的影響是激進的，但因為它採用高度複雜的數學與先進的電腦繪圖，作為前瞻性數學理論，沒有人能指責其操作者反數學。在深刻的意義上說，混沌理論是相對於近幾十年來投注大量資金炒作之原子研究的反應，混沌理論終於將科學的焦點回歸到我們都熟悉的「微觀」世界。

混沌理論低微地始於充滿沮喪的氣象領域。為什麼炙手可熱的氣象學家無法用更高效的電腦和越來越完備的數據來預測天氣？二十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Lorenz）無意中發現了混沌理論——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巨大與不穩定的天氣變化。他指出，一隻蝴蝶在巴西拍打翅膀可能會在德州產生一場龍捲風，稱為「蝴蝶效應」。自此之後，每當不預期地發現某個微小的變因，就有可能擴大影響至某個看似無關的科學領域，造成戲劇性動盪。

簡言之，天氣與許多世界上其他方面的領域，無論在我們的電腦裡累積多少數據，原則上都無法被成功預測。雖然蝴蝶效應並不是真正的「混沌」，因為它確實有自己一套複雜的因果模式，大多的因果模式遵循費根鮑姆常數

(Feigenbaum's Number)。但即使這些因果模式都眾所周知，世界上有誰可以預測蝴蝶什麼時候會拍打翅膀？

混沌理論的結果並不是真實世界充滿混亂或不可預知，而是真實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在實際上是不可預知的。特別是那些數學工具，例如假設光滑表面和無限步驟的微積分，在處理許多現實世界問題上具有嚴重缺陷。因此，本華·曼德（Benôit B. Mandelbrot）的「分形」就指出，以光滑曲線描述海岸線或地理表面並不恰當且具誤導性。

混沌理論用在人類活動上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例如股市運作。在此，混沌理論家們直接挑戰正統新古典經濟主義的股市理論：假設市場是理性的，也就是對未來無所不知。如果所有的股票或商品市場的價格，都在對未來完全理解的知識下，進行完美的貼現，那麼股市價格的模式必定是純粹偶然的、毫無意義的以及隨機的（隨機漫步），因為所有的相關基本知識都已納入價格考量。

荒謬地相信市場對未來無所不知，或是市場具有未來「機率分布」的完善知識，等於是愚蠢地假設真實市場上的事件都是隨機的，也就是說，沒有一個股票價格與過去或未來的任何其他價格相關。人類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事實卻是所有歷史事件都相互關聯，因果模式滲透到人類活動，同質性極低，也沒有什麼隨機。

憑藉其巨大的威望，混沌理論家在譴責這些假設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並斥責任何企圖從現實世界中的具體事件進行抽象的統計。因此，混沌理論家反對以月數據推算年移動平均的「平滑化數據」統計技巧，無論是價格、生產量或就業數據。正統統計人員在試圖消除鋸齒「隨機元素」並將數據從所謂基本模式中抽離時，已在不知不覺中擺脫了原

本要進行檢視的真實世界數據。

這是一些混沌理論提供給正統計量經濟學的顛覆性影響。如果理性假設理論與現實世界相違背，那麼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也同樣如此，以及那些採用無限分割假設的微積分、完美知識和其它精心設計的新古典經濟主義工具。新古典經濟主義者有很長一段時間，使用他們的數學知識與先進的數學技術作為武器，來抹黑奧地利經濟學派，現在出現了最先進的數學理論，並在不知不覺中重製了一些奧地利學派對於正統新古典經濟學扭曲現實且不切實際的批評。在目前數學領域的啄食順序中，分形、非線性熱力學與費根鮑姆常數等理論的排名遠高於新古典經濟主義採用的老式技術。

這並不意味著要接受所有混沌理論所提出的哲學主張，特別是一些混沌理論家主張自然是不確定的，或是原子、分子具有「自由意志」。不過，奧地利學派可以為混沌理論家從內部攻擊正統計量經濟學而歡呼。

6. 統計：由內擊破？

首次發表於 1989 年 2 月。

現在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但我在大學某段時間的主修是統計。在修畢所有的統計本科課程後，我參加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數理統計研究生課程，追隨著名的哈羅德·霍特林 (Harold Hotelling)，也是現代數理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聽了幾次 Hotelling 的講座後，我體會到一個領悟：我突然意識到整個「科學」的統計推斷，建立在一個毫無根據的關鍵假設。我離開了 Hotelling 的課程與統計的世界，再也沒有回來。

當然，「統計」的內涵遠超過單純的收集數據。統計推論是從這些數據中所得出的結論。特別是，除了美國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我們從來不知道所有的數據，因此，我們的結論必須建立在來自母體的非常小量樣本。在挑選出樣本後，我們必須找到一種讓報表能足以代表母體的方法。例如，假設我們要做出「關於美國男性人口的平均身高」的結論。因為沒有辦法讓我們去測量每一位美國男性的身高，我們會選用其中一種採樣方法來取出小數目的樣本，譬如 500 人，據此推測美國人的平均身高可能是什麼。

在統計科學中，我們從已知樣本推測未知的母體情況是基於一個關鍵假設：在所有的情況下，不管是處理身高、失業率或者是選舉前各候選人的支持率，我們所選出的樣本在母體中是依照「常態曲線 (normal curve)」分佈。

統計教科書中的常態曲線大多是呈對稱的鐘形曲線。因為假設所有樣本都根據這條曲線落在母體中，統計學家可以充滿信心地主張：依據他的單一或多個有限樣本，美國人的平均身高人口、失業率或任何其他的數字，在 90% 或 95% 的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內，絕對是 XYZ。簡言之，如果某個平均男性身高的樣本高度為 5 英尺 9 英寸，那麼每 100 個這樣的樣本中，約有 90 或 95 個落於 5 英尺 9 英寸的一定範圍內。這些精確的數字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假設：所有的樣本都依據常態曲線分佈於母體。

由於常態曲線的特性，民意調查機構便以壓倒性的信心斷言，布希受到某一個百分比的選民青睞，而杜卡基斯則是另一個百分比，這些推論數據約有「三個百分點」或「五個百分點」的「誤差」。正是因為常態曲線，允許統計學家不需要知道所有母體的資訊，而僅以幾個百分點的資訊，就能宣稱「絕對的知識」。

那麼，什麼是「常態分佈」這個重要假設的證據？什麼都沒有。這是一個純粹的神秘信仰行為。在我的舊統計教科書中，對於普遍真理「常態曲線」，唯一的「證據」說法是：當槍法很好的步兵開槍擊靶時，打擊點將趨向於在靶心週圍以類似常態曲線的方式分佈。對於統計推斷有效性的重要假設，基於這個難以置信的脆弱基礎。

不幸的是，社會科學傾向遵循已故羅伯特·門德爾松博士（Robert S. Mendelsohn）在醫藥中採用的同樣規律：不管步驟是如何不完善，直到出現一個更佳替代品前，從不省略任何步驟。現在看來，這整個建立在常態曲線的錯誤推理結構，已被高科技證實是過時的。

十年前，斯丹福大學的統計學家布拉德利·埃夫隆

(Bradley Efron)，以原始樣本為基礎，利用高速電腦產生「人工數據集」，藉由數百萬計的數值計算得出人口估計，而無需使用常態曲線或任何武斷的抽樣分佈數學假設。經過十年的討論和反覆試驗，統計學家普遍能接受實際使用這種「自助法 (bootstrap method)」，它現在已經開始接管這個專業領域。另一個斯丹福大學的統計學家杰羅姆·弗里德曼 (Jerome H. Friedman)，也是新方法的開拓者之一，稱「自助法」是過去 20 年甚至是 50 年內最重要的統計概念。

在這一點上，統計學家終於願意吐露秘密。弗里德曼承認在標準方法下，數據並不總是遵循鐘形曲線，而當數據不以鐘形曲線分佈時，你就會犯錯。事實上，他補充說：數據經常以完全不同於鐘形曲線的方式分佈。是的，我們現在發現「常態曲線」這個國王沒有穿衣服。古老的神秘信仰現在可以放棄了，常態曲線之神已死。

7. 人之行為的結果：有意或無意？

首次發表於 1987 年 5 月。

一些經濟學家堅持奧地利經濟學派只研究「人之行為的無意結果」，或是 18 世紀蘇格蘭社會學家亞當·福格森（Adam Ferguson）到海耶克（F.A. Hayek）以來最受喜愛的短語：「人之行為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

乍看之下，這個經常重複的口號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依靠屠夫或烘培師的恩惠提供我們每天的食物，而是他們追求收入與利潤的自利驅動，這是好事。他們或許有意獲得利潤，但滿足消費者的高效生產與繁榮進步，則是他們行為的無意結果。

但是，進一步分析這個口號卻會發現錯誤。例如，我們怎麼知道屠夫、烘培師或任何商人的意圖為何？我們沒法透視他們的腦袋並說出肯定答案。舉例而言，或許屠夫和烘培師在最大化利潤之餘，也閱讀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並且預知他們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有益於他們的同胞與整體社會。

當他們了解（上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後，他們有意地在最大限度下同時滿足消費者需求與自己的利潤。所以，如果像一些指稱所言，經濟理論只研究人之行為的無意結果，

那麼學習了這些理論的商人在成為進行有意行為的市場參與者後，是否會使得這些經濟理論無效？

此外，學習經濟理論實際上可能改變商人在市場上的行為。許多受反資本主義宣傳影響的商人，會因為罪惡感而有意識地限制自己追求利潤的行為，並錯誤地相信他們正在幫助他們的同胞。閱讀與吸收經濟理論分析，則可能會減輕他們的罪惡感並引導他們尋求最大化利潤。總之，現在他們充分認識到經濟學，並且預期其行為的結果將同時導致更高的利潤與社會繁榮。

那麼，「無意結果」的偉大之處為何？為什麼又不能同時研究「有意結果」呢？難道，這些在社會中累積的知識不會把「無意結果」轉變為「有意結果」？

不僅如此，Mises 的人類行為學明確指出：個體有意識地選擇手段，企圖達到所追求的目標。如果人會追求目標，當然就可以用常識推論出，他們預期「達到」（或者說「有意要達到」）他們行為的結果。米塞斯強調，「有意的選擇」使人成為市場或世界上具有理性的有意識行為者。傳統的經濟理論則往往落入一種陷阱：把人當成機器人或者是盲目地受刺激反應的阿米巴原蟲。

奧地利派的方法論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政治後果。或許，這也並不令人意外，那些相信「無意結果」而非「有意結果」的支持者，傾向於粉飾 20 世紀以來的政府擴編。如果行為大多是無意的，這意味著政府擴編就像大象 Topsy 長大一樣，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有意行為結果。強調海耶克的學說，可以把精英團體尋求政府特權的有意自利行為藏在斗篷裡，從而促使政府持續擴編。

推廣奧地利經濟學派有兩種方法。第一條路是以智慧與誠

實完善 Mises 的理論，毫不畏懼地高舉旗幟，並且直言不諱地指出有意藏在「公眾利益」與「社會福祉」等政府口號背後的特殊利益。

另一條路是為了尋求意見接納與尊重，小心地避免任何的「爭議」，淡化甚於完備 Mises 的訊息。甚至到了把「自由」從「自由市場」中分離的地步。這條路，只會鞏固大政府。

8. 利率問題

首次發表於 1988 年 2 月。

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印象主義」：假設過去數週或數月的社會或經濟趨勢會永遠持續。問題是，這並沒有意識到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印象主義一直以來都猖獗，特別是在公眾討論利率問題時。1987 年的大部分時間利率都保持在無情的高度，而「黑色星期一」後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利率下降，財經顧問就轉了 180 度，彷彿利率會永久保持下降趨勢地開始提出談話。

沒有其他的族群會比金融媒體更隨風搖擺。這種症狀源於不夠瞭解經濟學，因而盲目地對迅速變化的事件做出反應。有時，這種基本的混亂反映在同一篇文章中。因此，不久前通貨膨脹率為兩位數的那幾天，同一篇文章中預測利率會因美聯儲在公開市場上購買證券而下降，並且同時也說，利率將因市場預期通膨加劇而上升。

如今，我們也會讀到固定匯率制是不好的，因為不得不上升利率來保持美國境外的外資，但同時也會讀到匯率下跌是不好的，因為出於同樣的原因，利率將不得不上升。如果金融作家陷入不可救藥的混亂，我們又怎能期望公眾理解事實的究竟呢？

事實上，利率就像任何重要的價格，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複雜現象，其中每一個因素都可以在不同向度上改變，有時甚至是在矛盾的方向上改變。在其他價格的情況下，利

率與信貸供給呈相反走勢，而與信貸需求呈對應走勢。如果美聯儲在公開市場購買證券，從而增加信貸供應，這將傾向於降低利率。但與此同時，同樣的行為會增加銀行準備金，銀行會以倍數而無中生有地膨脹貨幣和信貸供應（時下約十比一）。因此，如果美聯儲購買價值一億美元的證券，銀行準備金將增加相同金額（一億美元），而銀行貸款和貨幣供應量將增加十億美元，使得信貸供給進一步增加，造成利率下降。

但憑印象就作出利率注定要無止境地下降的結論是愚蠢的。首先，信貸的供給和需求取決於更深層的經濟動力，特別是那些希望儲蓄、投資者的收入總量，而非願意消費的總量。他們儲蓄越多時，利率越低；他們消費越多時，利率越高。銀行貸款的增加或許會效仿真實儲蓄的增加，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通膨性銀行信貸是人為的、無中生有的，它並不能反映個體的潛在儲蓄或消費偏好。一些早期的經濟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強迫儲蓄」，更重要的是，它們都只是暫時的。當這些新增貨幣供應在市場上開始運作後，市場上以貨幣計價的名目價格會上升，而利率將反彈到近似原來的水平。只有透過美聯儲持續地注入通膨性銀行信貸才能保持人為的低利率，從而維持虛假又不健全的經濟繁榮，而這正是景氣的繁榮衰退循環中，繁榮階段的標誌。

但有一些其他事也同時發生。隨著價格的上漲，人們開始預期價格會再進一步上漲，並將通膨溢價估進利率。債權人不希望應收賬款的真實價值被通貨膨脹抵銷而將通膨溢價估算到利率中，債務人將同時願意支付通膨溢價，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他們在通貨膨脹中享受著意外的收穫。

這就是為什麼，當公眾開始預期進一步通貨膨脹時，美聯儲增加準備金將會提高而不是降低利率。當這種通膨性信貸終於停止加速時，利率會在資本市場（股票和債券）的蓬勃發展中停在最高處，緊接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經濟衰退，藉此清算通膨性繁榮時期的不健全投資。

另一個扭曲利率問題的因素來自國際方面。長期的趨勢顯示，資本會從低回報的投資（無論是收益率或利率）轉向高回報的投資，直到兩處的回報率相等為止。這在國境內或是國際間真實發生。在國際層面上，資金會從低利率的國家流向高利率國家，使得前者加息而後者降息。

在過去的國際金本位中，這個過程很簡單。如今，這個過程以法定貨幣為名繼續，但卻產生一系列被視為「危機」的結果。當政府試圖鎖定匯率時（例如政府在 1987 年二月的盧浮宮協議到「黑色星期一」期間所為），利率降低就無可避免地造成外資或外匯儲蓄的減損。

美國在當代的巨額貿易逆差下，難以在資金外流的同時保持固定美元，其美元下跌的壓力龐大。因此，在「黑色星期一」之後，美聯儲決定讓美元依市場趨勢下跌，從而使得美聯儲能進行通膨性信貸並降低利率。

需要澄清的是，此種人為利率下降僅可能是短暫的，「實際利率」會續而回彈。美儲聯在 1987 年春季以前為期幾年的持續性通貨膨脹，造成物價上漲的後果，進而使得利率也必然隨之上升。

此外，美聯儲在其他許多方面也落入自己造成的長期趨勢陷阱中；世界各地的均衡利率現象並不是簡單的「名目收益」，而是校正通貨膨脹後的「真實收益」。如果外國債權人和投資者開始發現收到的美元價值越來越低，他們將需

要更高利率進行補償，我們將很快地繞回到雙倍的利率上升原因。

在試圖向我的學生解釋複雜的利率、通貨膨脹、貨幣與銀行、匯率和商業週期時，我會以這個來安慰他們：不要怪我搞得這麼複雜，怪政府吧。如果沒有政府干預，這些主題會相當簡單。

9. 儲蓄過低？

首次發表於 1989 年 11 月。

近來在經濟學家、商人及政客界的強烈趨勢，是感嘆美國境內的儲蓄與投資金額過低。據指出，美國國民收入的儲蓄比例遠低於西德及我們擔心的競爭對手日本。最近，國庫局局長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嚴厲地警告美國儲蓄與投資的低水平。

這種說法應以不同層次進行考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統計數據通常會被操弄以誇大問題嚴重性。因此，這個可怕的數字（例如，美國的儲蓄只占 1.5% 的國民總收入）只提及個人儲蓄而忽略企業的儲蓄，同時，儲蓄與投資的主要來源「資本收益」也常常被忽略。

但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問題是：即使把美國的儲蓄比當成國民總收入的 1.5%，而日本的儲蓄比為 15%，那麼，儲蓄比難道會有所謂「恰當的數額」？

消費者會自行決定把他們的收入劃分成消費支出，以及預期未來收入的儲蓄與投資。如果瓊斯先生投資了 $X\%$ 以備將來所需，那無論是道德上或經濟上，能有什麼標準讓外人來譴責他不投資 $X+1\%$ 是錯誤或不道德的？大家都知道，如果他們減少消費並增加儲蓄與投資，他們將能夠在未來獲得高一些的收入。但是，他們的選擇取決於他們的時間偏好率：偏好在現在消費更甚於在未來消費的程度為何。因為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經驗、具體情況與價值觀的

基礎下做出決定，若是要譴責某個人所做的決定，必須以其它除了做決定之個體外的其它標準取代做決定之個體的喜好。

這種標準不會具有經濟效益，因為效率與經濟價值的定義需在個人自發性選擇的框架下決定。以「道德」來確定標準是非常不穩固的，因為道德的真理就像經濟法則一樣，只有定性而無定量。道德法則，例如不殺人、不偷竊，是定性的，沒有一種道德法則可以說：一生中不可偷竊超過 62% 以上的時間。因此，如果要把「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當成道德告誡，告誡者需要拿出一些量化的最優解，例如：具體而言，儲蓄什麼時候過低，什麼時候又是過高？模糊的告誡增加儲蓄，並不是道德，也沒有經濟意義。

但這些呼籲者提出了重要的一點。數量龐大的政府措施大幅癱瘓與降低儲蓄，並增加社會上的消費。政府在許多方面的強制性干涉，把整體社會的自願選擇由儲蓄與投資轉向消費。

那些抱怨儲蓄過低的人除了告誡之外，總是不說應該要如何改善。左翼自由派呼籲更多的「政府投資」或增加稅收，以減少他們稱為「反儲蓄」的政府赤字。其實，政府可以簡單又合法地擺脫自己對於偏好消費、減少儲蓄與投資的強制性影響。以這種方式，能夠解放被政府行為覆蓋的自願性時間偏好與個人選擇。

布希政府開始消除一些從 1986 年《稅收改革法》以來的強制性反儲蓄措施。一是取消對個人退休帳戶的扣除額，它消滅了中產階層儲蓄與投資的重要類別，二是徵用儲蓄的資本利得稅，若不把資本收益當成通貨膨脹的指數的意義上，資本利得稅是直接沒收社會累積的財富。

但這僅是冰山一角。只把政府赤字當成「負儲蓄」的說法，意味著高額稅收會增加社會儲蓄和投資。國民總收入的統計數字，假設除了福利金支付以外的所有政府支出都是「投資」，事實恰恰相反。

所有商業支出都是投資，因為它最終成為出售給消費者的商品，提高了生產。但是，政府支出僅僅只是政客與官僚為了增加收入、滿足他們價值觀的消費性支出。稅收和政府支出，把社會資源由生產性消費者原先打算花在個人消費或儲蓄的錢抽走，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政客、官僚、他們的追隨者與各種補貼上。

的確，以目前美國人遠高於 1970 年代的生活水準，現今美國的儲蓄和投資量偏低。但問題並不如那些抱怨者所歸咎，是因為個人和家庭沒有負起責任、消費太多而儲蓄太少。問題不在我們這些美國公眾身上，而在我們的統治者身上。

所有的政府稅收和支出，都在減少那些真正從事生產者的儲蓄與消費，成為那些非生產者寄生性消費支出的利益。雖然歡迎恢復稅收減免及廢除（不只是降低）資本收益稅，這些都是隔靴搔癢。

真正需要的是大幅減少所有的政府稅收和支出，不管是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聯邦政府。解除這個巨大的寄生負擔將大幅提高真正從事生產者短期內以及未來的生活水準。

10. 淺談供給面學派

首次發表於 1984 年 10 月。

體制派經濟史學家，對從斯密（Smith）、馬克思（Marx）到馬歇爾（Marshall）等人展開的經濟思想史，迫切需要找出一個放在最後一章的偉人，將經濟科學結束在最後的救星與最終頂點。他們最後的選擇共識，當然，是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但他的《通論（General Theory）》已經有半世紀歷史，而經濟學家已花了一段時間，替最後一章尋找新的候選人。

有一段時間，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短暫受注目，但他的問題，是他的理論大部分是在凱因斯的《通論》之前完成。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貨幣主義持續的時間長一點，但也遭遇兩個嚴重缺陷：（1）缺乏一個偉大的、綜合性的理論（2）貨幣主義和芝加哥經濟學派事實上是同一個理論，早在凱因斯主義時代之前，就被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和他的同事在芝加哥大學所推敲錘鍊。

從凱因斯以後就沒有新的可以寫了嗎？

從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至少有一個學派的思想提供了全新理論的印象標記。而經濟學家就像最高法院一樣跟從選舉結果，「供給面學派」成為值得關注的理論。

供給面學派是由當代經濟學學生，在缺乏重要論述甚至是主要領導者，且操作者之間也幾乎沒有一致共識的情況下

發展。但是，它能让高明的媒體得益又能讓政客和智囊團方便取用。它已經開始進入經濟史作品的最後一章。

供給面學派的中心主題，是大幅的所得稅率削減可以增加工作與儲蓄的動機，從而增加投資與生產。這種假設下很少人能例外。但這隱含其他問題。至少在著名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世界裡，降低所得稅率被視為政府赤字的靈丹妙藥；大幅削減稅率將增加總稅收，從而平衡預算。

然而，沒有任何證據能證實這種說法，事實上，真實情況可能完全不一樣。不能否認，如果所得稅率由 98% 降為 90%，或許有可能會增加總稅收；但在我們目前所處的較低稅率，這種假設沒有任何保證。事實上，從歷史看來，增加稅率常伴隨總稅收增加，反之亦然。

供給面學派比自吹自擂的拉弗曲線有更深層的問題。供給面學派並不關心政府總開支與赤字。供給面學派不在乎會把資源從私營部門轉到公共部門的政府開支是否需要緊縮。

他們只關心稅收。事實上，他們對赤字的態度接近老凱因斯主義——我們只是欠自己錢。更糟的是：供給面學派希望維持目前龐大的聯邦支出。就像民粹主義者所宣稱的，供給面學派的基本論點是，人們希望維持目前的消費水平且人民不應該被拒絕。

比起供給面學派對消費的態度更令人疑慮的，是他們對貨幣的觀點。一方面，他們說他們支持「硬通貨」並提倡以「金本位」來終結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他們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的持續攻擊，不是他的通膨政策，而是「貨幣緊縮」削弱經濟增長。

總之，這些自稱「保守的民粹主義者」，在他們對通貨膨脹與廉價貨幣的獻身精神下，開始聽起來像老式民粹主義。

但是通貨膨脹與廉價貨幣要如何以他們倡導的金本位達成？

這個問題的答案，隱藏著供給面學派看似矛盾的關鍵。他們倡導的「金本位」只是沒有實質內容的煙幕。銀行不需要供金幣兌換，美聯儲擁有權力修改黃金美元的含金比例，作為微調經濟的工具。總之，供給面學派所希望的不是老式的硬通貨與金本位，而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假金本位」，該體系在對美聯儲的通貨膨脹與貨幣管理政策的鞠躬哈腰下崩潰。

供給面學派的中心學說揭露在它最暢銷的哲學宣言—裘德·萬尼斯基 (Jude Wanniski) 所著的《世界的運作方式 (The Way the World Works)》中。萬尼斯基的觀點是：大眾永遠是對的。

在經濟上，萬尼斯基聲稱大眾想要一個巨大的福利國家、大幅削減所得稅，以及預算平衡。這些相互矛盾的目標要怎麼實現？答案是拉弗曲線的騙術。在金融領域上或許會再補充，大眾要的是通貨膨脹和廉價貨幣，同時要回到金本位。因此，基於「大眾永遠是對的」，供給面學派提出給大眾他們想要的東西，透過「假金本位」，實現通貨膨脹、廉價貨幣加上穩定的假象。

供給面學派的目標是「民主地」提供大眾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最好的定義，就如門肯 (H.L. Mencken) 所言：「民主的理論就是相信普羅大眾清楚認識他們的所需，而且他們任何索求都應該得到滿足。」

11. 凱因斯主義者迷思

首次發表於 1987 年 9 月。

凱因斯主義又再次露出馬腳。1970 年代末，他們的信心被通貨膨脹後的經濟衰退打擊，他們不僅沒有預測到這種現象，其存在也違反凱因斯主義的基本原則。自此之後，凱因斯主義者已經失去了他們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雖然他們在經濟學領域中仍占多數。

在過去的幾年裡，凱因斯主義者以他們慣有的傲慢向我們保證通貨膨脹不會到來，儘管事實上，通貨緊縮的英雄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持續地以兩位數字的成長率灌注貨幣。凱因斯主義者責罵硬通貨的倡導者，並宣稱僅管貨幣通膨，美國工業的產能仍然「過剩」或「閒置」，整體利用率落在某個分母的 80%。因此，他們指出，貨幣需求的擴大會限制通貨膨脹。

大家都知道，儘管凱因斯主義保證通貨膨脹不會重燃，但在產能閒置的情況下卻依然發生（通貨膨脹），留給他們苦心思索的困擾。通貨膨脹率由 1986 年的 1% 上升至目前的 6%，利率也在明年再次上漲，不斷貶值的美元提高了進口價格，而黃金價格則上升。再次，硬通貨經濟學家和投資顧問已被證明遠比體制庇護下的凱恩斯主義者可靠。

解釋凱因斯主義錯在何處的最佳回答，是回以他們對批評者的一貫回覆：反凱因斯主義者擔心通貨膨脹或政府計劃的浪費，是在假設資源已被充分利用。他們說，消除這種

假設後，凱因斯主義在這個存在失業與閒置資源的世界裡，是正確的。但這種指控應該被轉向，拿來問凱因斯主義者：為何會出現閒置資源（勞動力或物品）？閒置資源並非上天掉下來的禮物，當然，它常常發生，但這些說明了什麼？

問題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凱因斯主義者略去了對價格的討論。這個瘋狂的經濟分析殿堂，不知怎的，略過價格，只談收入、支出和就業。

我們知道，「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指出，如果有市場上某樣商品「過剩」卻難售出時，唯一的原因就是它的價格過高。治癒過剩或資源閒置的方法是降低要價，無論是勞動的工資率、機器或廠房的價格，或是零售商的庫存貨品。

總之，如 William Harold Hutt 教授在 1930 年代的凱因斯主義革命中被忽視的出色意見所言：閒置或未利用之資源，只會發生於資源所有者拒絕以市場出價銷售的有意保留。在深層意義上，所有失業和閒置資源都是出於自願的。

為什麼資源擁有者要在市場上刻意保留資源？通常，此種持有是為了獲得更高價格或工資。在一個自由和不受阻礙的市場經濟中，資源擁有者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錯誤，在他們的勞動或資源得不到任何回報而感到疲倦時，他們會把要價降低到剛好能售出的程度。

當然，在機器或其他資本財的情況下，資源擁有者可能會作出嚴重的不良投資，這往往是因為銀行信貸與中央銀行所建立的人工繁榮。在不良投資的狀況中，價格可能低到勞動者認為不值得為其放棄自己休閒時間，這種失業純粹是自願的，失業者保留勞動力為的是更高的工資。

更糟的是，從 1930 年代開始，政府和受其特權的工會已經大規模介入勞動力市場，並將工資率提高到高於市場水平，

從而造成較低專業技能與產能之工人的失業。政府以最低工資法及強制性工會的形式干預勞動力市場，造成強制性的失業，同時再以失業福利金與失業保險來補貼失業，從而確保了永久性的高失業率。我們為此支付了多少，就會有多少失業。

隨著這個分析而來的，是通膨貨幣與增加政府支出也不一定會降低失業或閒置產能。失業或閒置產能的降低，只會發生在勞動者或資源所有者認為他們會得到較高回報，並滿足部份自己堅持的要求時。而這只能透過支付資源的價格（工資或物價）上升。換句話說，更多的供應或產能使用只能透過工資與價格上漲，即，價格的通貨膨脹。

一如往常，凱因斯主義者把整個因果過程搞反。現在的事實明顯表示，我們能夠，也正處於通貨膨脹與資源閒置同時存在的情況。

12. 凱因斯主義的終極版

首次發表於 1989 年 1 月。

八年雷根主義留下的衆多諷刺但不幸的遺產之一，是凱因斯主義的復活。從 1930 年代後期到 1970 年代初，凱因斯主義在經濟學界和華盛頓的權力走廊中，高調地保證著，只要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繼續掌舵，現代的宏觀經濟學庇護，一定會為我們帶來永久的繁榮，不會有通貨膨脹。但通往伊甸園的路上發生了一些事：強力通貨膨脹與 1973 到 1974 年間的經濟衰退。

凱因斯主義扣除它的代數與幾何術語後，它的核心驚人地簡單：經濟衰退是因為花費過少，通貨膨脹則是花費過量所造成。花費的兩大種類（消費、投資）中，消費是被動、先決的，且幾乎機械性地被收入所決定，因此，適量花費寄望於投資。但私人投資者，雖然積極、果斷又機械化，但同時也不穩定、易變動，且不可靠地依賴於凱因斯稱為「動物精神」所至的經濟波動。

幸運的是，經濟環境中有另一組人馬也扮演著積極、果斷的投資者，而且如果在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引導下，同時還兼具科學與理性並且為所有人謀利：政府大家長。當投資者和消費者花費太少時，政府可以也應該要介入，透過財政赤字來增加社會支出，從而提升經濟並走出衰退。當私人的動物精神表現得太狂野時，政府應該也要介入，透過凱因斯主義者說的「吸走（我們的）多餘購買力」來減少私人花費。

順道一提，在嚴格的凱因斯理論中，凱因斯主義者在通貨膨脹時期也可以選擇呼籲降低政府開支來減少整體花費，而不是讓政府吸走我們的多餘購買力。但削減政府預算（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削減，不是增長率削減的假削減）在現今是不容想像的想法，例如，秉承傑佛遜等人對美國憲法的嚴格解釋，和其他類似的原因。

剛開始，凱因斯主義者發誓，他們也像那些保守的反對者一樣，贊成「預算平衡」。只是他們沒有像那些保守反對者一樣堅持「會計年度的預算平衡」，他們也會平衡預算，只是以商業週期來算。因此，如果在四年的經濟衰退後有四年的經濟繁榮，在經濟衰退期間的政府赤字就會被經濟繁榮時期的盈餘補償，超過八年的週期後，就能達到預算平衡。

顯然，「循環平衡預算」是第一個被丟到歐威爾式忘懷洞（memory hole）裡的凱因斯主義概念，因為事實顯示，不會出現什麼盈餘，只有比較小的或比較大的赤字。凱因斯主義者為此做了微妙但重要的修正：經濟衰退期間赤字規模較大，經濟繁榮時期的赤字規模較小。

真正的除魔時刻，是 1973-74 經濟衰退期間兩位數字的通貨膨脹，以及緊接而來在 1979-80、1981-82 經濟衰退期間更激烈的通貨膨脹。如果，政府應該在經濟衰退時加速整體花費，在經濟繁榮時踩剎車，那麼，同一時間發生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與破產）和急劇的通貨膨脹是怎麼回事？凱因斯主義者要怎麼解釋？同時催油門和踩剎車嗎？同時發生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的嚴峻事實，違反了凱因斯理論的基本假設和凱因斯主義政策的關鍵程序。自 1973-74 後，凱因斯主義者的智慧已死。

但，很多屍體拒絕躺下，特別是那些不得不放棄學術與政界權力地位的精英。政治或社會學的關鍵法則是：從來沒有人辭職。因此，凱因斯主義者堅守他們的權力地位，從來沒有辭職，雖然少了幾分宏偉承諾的癮頭。

他們學乖了，只保證盡力做到最好來維持現行系統。基本上，因為凱因斯理論的基礎已死，凱因斯主義者已經成為純粹的權利經濟，致力於作一些外圍調整來保持現有系統運轉，在呵護系統的同時度過下一次的選舉，並希望透過修補、控制，還有催油門和踩剎車間的迅速應變，能讓某些東西繼續運作，至少要多保住幾年他們的輕鬆職位。

然而，在一片混亂中，凱因斯主義者仍保有幾個光榮時代遺下的主導趨勢：（1）偏好持續赤字（2）忠心於廉價貨幣與（至少）溫和的通膨（3）堅持增加政府支出（4）對高額稅收的永恆愛好、對赤字的些微降低，更重要的是，給一些貪婪、自私、短視的美國大眾會造成痛苦的支撐。

雷根政府企圖要制度化這些好處，這是看似常發生的美國場景。赤字變得更大且似乎永遠會如此，不同的是，這些凱因斯化的前自由市場雷根主義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巧妙地辯護巨額赤字。現在凱因斯陣營裡唯一的爭議，是踴躍加入凱因斯陣營的「保守供給面學派」，他們同樣獻身於通貨膨脹與廉價貨幣，不同的只是他們反對加稅並要求溫和地減稅。

凱因斯主義在雷根政府中的勝利，要從主要競爭對手的迅速消亡算起—受學術界尊敬的貨幣主義。貨幣主義鼓吹所謂「科學預測」，作出了一系列災難性的糟糕預測，最後在拼命地想找出哪裡出錯、應該加速哪種貨幣供應的混亂中撤退。傾凱因斯主義的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取代

傾貨幣主義的唐諾·瑞根（Donald Regan）成為財政部長，象徵著貨幣主義的崩潰。凱因斯主義在雷根第二任任期內扮演主導角色，過渡到傾凱因斯主義的布希團隊（布希一直有強烈的凱因斯主義傾向），平順到難以察覺。

那些把重要議題減化成電視形象與無關痛癢爭論的當局與競選活動，恢復了錯誤經濟信條的主導地位。這些信條，帶給我們從羅斯福第二任開始的每一屆政府所慣用的政治經濟學。

把「擺脫政府」口號和「不斷升級的大政府」現實成功結合起來的政府，同樣會以繁榮和自由企業之名，帶來失敗的國家凱因斯主義，這決不令人意外。